

▶▶▶ [上接 A3版]

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宣布道：“共产党人可以写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并提出，在最先进国家实施的十大纲领性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到国家的组织手中。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 and 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而中国古代，特别是管仲在齐国实施的道政社会主义既坚持了《共产党宣言》宣布的公有制原则，也实施了主要的政策措施，甚至超出这些措施。在坚持公有制同时，保护了民众合法的私有产权，实施了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的混合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何谓道政社会主义？

总结管仲的思想理论与 41 年执政实践就是：“以人为本”，遵道为政，德治与法治并举，“废私立公”，“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实现有适度贫富差距的 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由于其政体与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尊道而为”，故称之为：

道政社会主义。其基本内容就是建设小康社会。

(三)建设富有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

管仲系统提出了道政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并在实践中大获成功。

1. 坚持土地等资源公有制

管仲认为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保障民生的物质根本，因此明确主张实行国有制度：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不公平折算而划一，政事活动就无法公正。没有公正的政事活动，生产就无法管理。

他告诉齐桓公，由于蚩尤独占矿山资源后，制作兵器与十二个国家发生战争，导致“伏尸满野”，指出资源被独占是战争的根源；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钎、矛、戟等兵器，于是这后，露出金属矿石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又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又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而怒发动战争，便形成伏尸遍野的惨烈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于是警告桓公，国家如果失去了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就无法保障民生。特别是面对富商巨贾们掠夺普通百姓，出现“一国二王”的时候，国家就不能有效管理国家；

桓公问：“什么是一国二王呢？”

管仲说：“现在国君直接征收正税，老百姓为了交税而急于抛售产品，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里。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商人乘人民危险困难之时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加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

所以，如果国家不能严格控制山林、沼泽和草地，就不能成就天下大业。”

因此，他主张国家一定要统一掌控土地等资源这一经济命脉：

管子道：“……善治国的话，就掌握国家的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经济，用政策缓急来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就是可以做到以一变百的。他并不曾向人民索取，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周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物资与政策来驾驭天下了。”

2. 国有民营 国民分利，实施混合式市场经济

土地等资源国家所有，但如何开发利用资源呢？

管仲实施资源国家所有的公有制，然后将所有权与其上的使用权、经营权、获利权等进行法律界定后，采用承包、租赁等方式，在保证国家所有前提下，使民众获得使用权、经营权和获利权等产权，然后与民分利；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善于分利于民。圣人不擅长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样了。自己总是贪心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以，国家有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善于把产业委托于民。

与经济模式就是“国有民营，官民分利”的政策与经营模式。

当时一位叫“衡”的学者向齐桓公建议，由政府来开发矿山资源。管仲说：不可以。如果派囚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愤怒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治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贼”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只要算好它的产值利润，由百姓分利七成，国家分利三成。国家运用轻重之术调控价格，那么，百姓就会努力生产经营听从政府安排了。

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制

度：通过民众承包租赁等方式开发资源，使民众活动了开发权，经营权与获利权等衍生产权，国家与民众共同分利，而实施的效果非常好。

事物的道理说明：把土地折算分租承包，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

这个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的经济模式充分发挥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作用，既保证了资源的公有制度，又防止了资源出现公地悲剧，还有效地开发利用了资源，真正实现了“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思想。

3. 依法保护公有与私有产权
管仲认为产权界限不清，赏罚不明，那么人民就会轻视财产，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而“人民不怀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己的田产。”

人民有了产权，还要确实保护人民的各项合法产权不被剥夺；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人民的财产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

利不可法(废)，故民流(留)。

如何保护人类的产权呢？提出了。

管仲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的思想：

依法治国，举错(措)而已。

管仲通过建立完善的法治来保护公私产权。例如商品交易，无论是民间交易还是国家的公共采购都通行签订合同进行，包括投资贷款都签订合同，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保护。

管仲说：“其在万物者，立费而行，故物动则应之。”

“对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规格质量和国家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家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县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解决。’”

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

如果有土地经营权的在贷款时就可以用于抵押，获得翻倍的贷款。

管子曰：“请立费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皆为费国。有田倍之，限制了富家对民众的财富掠夺；

穷人并非不愿意夺取富人的财物，然而他们不敢，是因为法律不让他们夺取；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们也不敢，是因为他们畏惧法度的严惩。

4. 动态分配与界定土地产权，实现持久的公平正义

在农业领域，管仲继续实施井田制，在将所有权与经营权获利权分割，授予民众经营权，获利权等产权的同时，进行改革。由于每个家庭人口也会因生老病死等发生增减变化，因此当初的，要持久公平公正的，多年以后就不是了，因此，要持久公平公正的，就不搞土地世袭制，实行每隔十年重新分配的制度。

三年修整一次田埂，五年修整一次田界，十年进行一次重新划定。这些都是国家的土地分配制度。

可见，人民的土地产权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周礼》规定三年变动一次那样频繁，而是相对稳定，随着情况变化动态调整，真正实现持久的公平正义。

为了繁荣经济，齐国还首创建立了国有盐铁企业，开发与利用国家的战略资源，为国家提供强大的财政收入，并因此反哺农业，免除农业税，使国企成为稳定经济的定海神针。

在让国有企业掌握战略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宣布，国家要像鸟保护卵那样保护民众的产权；

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心而纪”。

齐国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正好说明齐国依法治国，对产权的保护十分到位。

5. 国家通过粮食与货币双向宏观调控市场

管仲认为：凡国家不能调剂人民的财富收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业流通各国环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市场。

粮食安全，多管齐下，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与粮食调控基金，实施一系列货币信贷政策鼓励与保护粮食生产。

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市场商品有余人们就肯于低价卖出，君王主应该以低价时收购；市场商品供给不足，人们就愿意高价买进，故君王主应该以高价时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商品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宏观调控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相对较

高价格购取较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相对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商品。各种商品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调控……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

实施这些政策就可以使五谷粟米等商品供求均衡，满足民生，防止富商巨贾通过操控市场掠夺民众财富。

管仲认为，国家还要通过货币来进行调控粮食与市场；善于治国的君主，应该掌握货币这个交易媒介来调控粮食万物，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力量。

基于此，建立了“轻重九府”这个准中央银行管理国家货币，调控市场。

管仲说：“以珠玉为上市，黄金为中市，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

在掌握粮食货币同时，创造性的通过粮食、国家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奢侈品等方式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再用货币与粮食对市场供给需求进行双向调控，于是建立起独特的用粮食与货币双向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机制。

管仲调控市场的具体作法就是均衡法和平准法。均衡法主要指的是聚散天下资源商品。而平准法指在聚散天下物资的时候，按需求供给和公平价格削峰填谷，合理配置资源。因此，二者互相配合：既防止通胀也防止过剩，实现比较平和稳定持续增长。

6. 人人共同富裕，适度富裕

道政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因此它首先要使人民富裕；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国家贫穷就难以治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首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管仲发现人性的缺点：穷困了就往往不知廉耻，富裕了往往为富不仁，都难以管理，因此要消灭贫困，限制大资产者，实现人人适度共同富裕；

人太富裕了往往恃财自傲，不容易管理；人太穷了则不知羞耻……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

人民太贫穷，无法生存就会抢夺。造成社会动乱。资本过分集中与集聚造成一些人太富裕，他们会为了利益最大化就会操控市场，左右社会，形成“一国二王”的现象，就会颠覆共同富裕的社会模式。

因此，管仲提出了“富有度”，即有适度贫富差别的共同富裕。

(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统一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管仲道政社会主义实践使齐国迅速富强，于是他辅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天下统一的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九合诸侯就是九次国际峰会。

第一次国际峰会：止戈除暴 实现天下和平。

管仲认为“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因此，制止战争实现和平就成为第一次国际峰会主题。最后达成的共识与准则就是：停止战争，天下和平。

第一次会盟诸侯，桓公下令：“没有上帝的命令，不许有一天发生战争。”

第二次国际峰会：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止戈除暴，实现天下和平后，第二次峰会主题就是解决战争产生的孤寡老人和孤儿寡母的抚恤养老等问题。

桓公下令：“要供养孤老，供养常病者，收养孤儿寡妇。”

这次峰会再次体现“以人为本”的道政思想，并影响天下各国。

第三次国际峰会：建立天下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战争遗留问题解决后就应该振兴经济，实现国际自由贸易。因此本届国际峰会达成的准则是：各国田租只收取百分之五，市场收税百分之二，关税收税百分之十，不要使人民缺乏耕织的生产工具。关税降到 1%，建成天下统一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

第四次国际峰会：修建国际通道，统一国际技术标准。

实现国际自由贸易还必须要有畅通的物流通道，消除货币、技术质量标准不统一的障碍。因此第四次国际峰会的主题是：修道路，借度量，一称数。数译以时禁发之。”

此次峰会影响深远。战国时代的子思就说到当时统一的情况：“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之后的五次国际峰会解决了宗教信仰，礼祭祖先与上帝，治理贪官污吏，表彰道德模范，固圉贡贾夷和天下治理体系（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所以，孔子对管仲反复称赞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威尔·杜兰特对管仲予以了高度评价：“在这 55 个侯国中，最重要的是齐国与秦国。齐国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齐国最有组织才干者，即是管仲……在他的治理下，齐国大治，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市值稳定，文化灿烂。”

而梁启超则在其专著《管子评传》中称赞管仲为中国人的诚信；目睹于世界，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的伟大人物。

(五)小康社会理想与后世的社会主义实践

孔子描述了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小康社会主义：

如今大道已经消逝，天下分成了一家一户的财产。人们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了自己……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因此成为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们彰显礼制的内涵，用来考察人们的诚信；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有权势者也要罢免，百姓也会视为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尚书》、《逸周书》、《管子》、《史记》、《汉书》与其他众多中国古籍记载都证明，孔子所言不虚，小康社会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真实历史，只是被人误读误解(由于篇幅不展开，见拙作《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整体与公正》)。

孔子强调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公平分配财富才能安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孟子在强烈谴责现实贫富两极化是率兽食人 后 力劝君王们实现小康。

宋、明等各朝英明的政治家有所继承与实施。威尔·杜兰特就指出，正是汉武帝实施社会主义使汉朝达到鼎盛时代。康有为大弟子，哥伦比亚博士陈焕章认为，桑弘扬“是如此大规模上成功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人。”王莽实施了恢复井田制，阻止土地兼并和均贫富三大政策，胡适因此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综上所述，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正是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

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苏东国家实践

西方在中世纪后期，诞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发表，奠定了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模式。

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是财富分配的方式，而其分配的根本原则就是按资分配，因此，资本所有者总是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被资本垄断占有。卷入资本主义运动的国家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社会日益分化为严重贫富悬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劳动者成为被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国家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消灭私有制，减少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构想。《宣言》的思想与管仲指出的“私者，乱天下者也”，“有众废私”等思想是一致的；而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管仲“废私立公”思想，孔子、孟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如出一辙。《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在最先进国家实施的十大纲领性措施在古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实现过许多，并根据历史与国情进行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苏联作为第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抛弃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施计划经济。

但是苏东国家历史整个西方历史一样，没有像古代社会主义和经历经验与教训可以借鉴。

列宁后来虽然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完全抛弃市场，并写了《论合作制》一文，表达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不久就去世，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也没有被理解与贯彻，于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

苏东国家计划经济最初展示出高效的特点。但由于没有历史传统经验教训可资借鉴，理想主义地完全抛弃市场，僵化的体制不能持续发挥资本与劳动的积极性，在官僚腐败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展开等内外因素影响下，最后彻底失败了。

五、当代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融合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人？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也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

(一)从管仲“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到毛泽东“人民万岁”

管仲与齐桓公讨论齐国顶层设计的时候指出，从“建立王业的开始，就要‘以人为本’。根本治理则国家巩固，根本混乱则国家危亡。”他还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天，国家不是君王至上，而是人民至上；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

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击之则亡。”

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都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时就

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人民游行的滚滚洪流时喊出了“人民万岁！”

同样是在天安门上看到这一幕的叶仲勋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是社会根本道德原则。一九五〇年，毛泽东在纪念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后，就用管仲思想来阐述惩治官吏腐败：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季自成。”

(二)从管仲“废私立公”到宪法规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管仲坚持“废私立公”，“有众废私”等指导思想，将土地等资源的公有制作为齐国道政社会主义的根本产权制度，而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六条就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基本是一致的；

即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三)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管仲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实践了人民“富有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而孔子孟子则提出了大同与小康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参与起草与重要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一决议表明，中共历史上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邓小平也将“共同富裕”阐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习近平主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并将消灭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两个一百年的根本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实践者与创新者，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与创新者。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依法公平保护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实现全面小康”，管仲的道政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都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和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若此，必将有力促进当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完美融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光彩。

(作者简介：李学俊，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学术部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约研究员)